

松嫩平原的秋

□修成国



年近九旬的老父亲站在小村东头的庄稼地边，望着大平原上那海洋般的玉米，乐得满脸像一簇盛开的秋菊。

父亲与黑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那些年整天大喊“跨黄河”“过长江”，人们成天绑在生产队拼命干活，可亩产连那500斤的“黄河”都跨不过去，更甭说800斤的“长江”了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包产到户科学种田，亩产一下子就翻了好几番。二弟成旗种了20亩玉米，虽说今年有水灾，还是获得了大丰收。我问父亲：“成旗种的这20亩玉米，今年能产多少斤？”

父亲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猜不出来。”我根据往年的产量，大着胆子说：“亩产2000斤，总收成4万斤？”然后瞅瞅二弟。

二弟笑了笑说：“还是个保守的数字。今年亩产至少可达到2600斤，总产量能达到5万多斤。有的地块能达到3000斤。”

我惊讶地把嘴张得老大：“还什么‘长江’啊‘黄河’啊，这简直是跨过美国的‘密西西比河’了。”

父亲在一旁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：“去年亩产才2000斤，怎么今年一下子又提高这么些？”

这丰收的景象和喜讯，令人惬意鼓舞。但我知道，收获丰收的成果却是苦差事。“三春不如一秋忙”，根据往年的经验，从割倒、掰穗、拉运、扒皮、脱粒、晾晒，到拉秆棵、粉茬子，真正忙完秋收，怎么也得个把月。用农民的话说，要扒下一层皮呀。人手多的还能快一些，也能少挨些累。可是，村里年轻人都跑到城里打工去了，三秋大忙也不回来，因为他们也嫌农村的活太累。再说，很多年轻人也不大会干农活，这就苦了村中的中老年人了。

我出身农村，深知秋收劳动的滋味。前些年，我曾经对二弟说，有联合收割机就好了。可二弟不屑：“谁家用那玩意儿呀，那得花多少钱呀。”

我说：“一亩地有100多元钱就差不多了。”

二弟说：“100多元就不少了，得打好几天工才能挣回

来呢。我这20亩地得花2000多元，得出去打几十天的工。与其花那么些钱用那玩意儿，还不如自己受点累慢慢收了。”

二弟的话我觉得也有道理，村民们有自己的算账方法。今年我终于有时间了，就准备给二弟搭把手忙活秋收。尽管我也多年不干农活，但总算多个人手。谁知二弟却笑着说：“谢谢大哥！今年哪，连我都不用出那么大的力了，我已经联系玉米收割机了，今天下午就来，半天就全收拾回来了。”

果不然，刚吃过午饭，一台红色的高高的玉米收割机就开到家门口了，开车的小伙子高声喊着：“快点呀，下午把你家收完，晚上还有两家呢。”于是，全家人立马出动，还有五六个邻居赶来帮忙。

玉米收割机开进那森林般的玉米地里，在一片刷刷的声音中，那又粗又壮又密的玉米，立刻从离地面不到一尺高的地方被齐齐地切断，接着便被吸入机器中。只是几秒钟的工夫，那足有两三米高的玉米秆就变成了碎屑，从机器侧面的出口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撒出去，又纷纷扬扬地落在了地面上。而那些被数层玉米叶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玉米穗子，瞬间就被剥掉了叶子，黄灿灿的玉米棒子从机器后边的一个漏斗里哗啦啦地流将出来，随即被紧随其后的拖拉机装入斗中，运回了家中的院子里。如同柄柄利剑直指天空的玉米茬子，也被机器上的圆盘耙打得支离破碎，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。秸秆还田，又成了上好的肥料。就这样，玉米收割机每次同时收割两垄，每亩地只需十几分钟。二弟的20亩玉米，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收完了。

晚上忽然想起二弟曾经嫌收割机太费钱的事，便问了他一句。结果二弟爽朗地笑了：“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，你还提它？这一晃七八年了，人们的观念早不一样了。那几年我们都身强力壮，不拿出力当回事儿。现在都五六十岁了，干不动了。再说那些年家底子薄，舍不得

花那些钱啊。现在科学种田，亩产逐年攀升，加上其他收入，村里人不在乎使用收割机这几个钱了。听说机器进了村，抢着排号呢。后院的林永盛，看见机器立马从兜里掏出2000元钱，叫机主先给他家收。机主没收，说别人家早就排好号了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不能不讲诚信呀。林永盛也只好排队等着了。”据说这机主脑子也很活，雇了工，人休机器不休，白天收两家，晚上还要收两家。

机器收割，比人工要快上几十倍，更重要的是免了繁重的劳累之苦，对农民的身体和精神是一种难得的解放。但它的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：只能收割站立的玉米，对倒伏的束手无策。往往收割机收完，还得按垄检一遍。所以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同三弟一起下地，帮二弟检遗漏的庄稼。我们一个人管三根垄，10亩地三个人一个上午就检完了。检回来的粮食大约有1000多斤。而且，由于收割机机体较重，被其碾压过的玉米成了一地的玉米粒子，根本没法检了。我们粗略估算，每亩地少说也漏了三四十斤。照此推算，全村50多户人家的1000多亩地，如果全部机收，得损失三四万斤粮食，这个太可惜了。不仅如此，机收过程中，庄稼秆被全部粉碎，其实那是乡亲们烧饭、取暖的材料。同时，玉米秆还是制作饲料、墙体材料、沼气及其他制品的原材料，就地粉碎又是一种巨大的浪费。好在村中还有部分人家没有用机器收割，留下来的玉米秆大家就串着用吧。很多事都难得十全十美啊。

那天在算账的时候，我问二弟：“你这20亩地产的粮食今年能收入多少钱？”

二弟说：“5万多斤玉米，如果按每斤7角5分计算，可以收入近4万元吧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脸上荡漾着笑容。

“那么，你的投入是多少呢？”

他掐着指头，“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柴油等全部投入大约5000元吧，人工不算。”

“不是国家还给了农民一些补贴吗？”

他又掐着指头算着：“一共补三次，第一次种子补贴费1600元，第二次是农药、化肥补贴2000多元，第三次是刚不久补的，是柴油补贴，也有700多呢。”

我算了一下，这几项加在一起有近5000元了。“这么说，你种地的所有投入，国家几乎都给补了？”于是，我编了几句打油诗给他：“农民二哥赛神仙，种地出力不出钱，一年忙乎个把月，到秋收入4万元。”

二弟听了后，憨憨地笑着说：“神仙可不敢比，主要是赶上了好时代。”停了一会儿，二弟又接着说：“其实，也没那么神仙，别看投入少了，收入多了，活计也不那么累了，可这心却没那么静。现在，咱们当农民的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。自从春天把种子下到地里，就盼望着风调雨顺。你知道，咱家这儿无江无河，也没有水库，雨水太少，担心闹旱灾。雨水太大，又担心闹涝灾。还担心闹风灾、闹虫灾……一直到了秋，粮食进了院子，这悬着的心才踏实了。”吃完晚饭，二弟要帮连夜用机器收玉米的邻居，这日子口大家都是互相帮忙共同出力的，于是他匆匆地走了。

快到中秋了，皓月当空，正是秋收的好时机。田野里到处机器轰鸣、人声鼎沸。村路上，汽车、拖拉机、马车、驴车，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；在家家户户的院落里，灯火通明，一片繁忙……松嫩平原大地上，一首欢快热烈的丰收曲，正在凉爽的金风中鸣响。



□白涛(蒙古族)

漫瀚准格尔

准格尔，你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最东方，最早迎来了高原的日出，最早获得了温暖的能量；准格尔，你斑驳凸凹的大地，仿佛民歌手奇福林那一张起伏难平的脸……漫瀚，奔哈，沙丘，海子，浪涛汹涌着远远地来了，狂烈的高原正扬起漫天沙粒与雪霰——苍苍世间兴许根本就没有哪一种调式能如漫瀚调这般直白、执拗、激烈、豪爽、忧伤与幽默！

蒙古人奇福林站在沙圪堵与十二连城的连绵山峁之上，一曲高亢激烈的长歌震颤了准格尔的苍茫大地……

是谁最早把蒙古的草原长调与塬峁沟壑的晋陕民歌拧在一块儿？是谁最先站在高原与山峁之上，唱出那沧桑沙哑而锐利的第一声漫瀚？这远古而来的漫瀚调，秦人出身的始皇帝唱过，胡汉混血的唐玄宗也唱过，中华一家的康熙大帝就更莫说了。都是混合混血，都是搅拌掺杂，都是缠绕纠结，在一起再难分开！北风起时，狼烟伴着马群的腥膻，奶酒伴着唿哨，草原人在歌声中听见了自己的风吹草低；南风再起，麦黍香飘过黄河，胡麻油蹭亮了羊皮袄，晋陕人在歌声里看见了日子的高低起伏……

据说，这漫瀚调是一片高原与另一片高原的碰撞会合；在高原与高原的中间，是黄河最大的转弯处——八百里河套，晋陕蒙的黄土与黄沙！听说，土默特民间艺人“老双羊”从“风搅雪”中走出来，拼尽一生力气喊出了坐腔；又听说，走西口的后人“万人迷”在“顺天游”里漫游出了二人台。这漫瀚之声散漫开来，弥漫了一大片，风卷着流沙淹没了一切……

此时的大河南北，沙丘上，山峁尖，沙蒿蒿林和柳林子边上，一缕缕青岚升上了天空——“塔奈”(蒙语：你)到了“玛奈”(蒙语：我)家，正好“玛奈”去会巴雅尔(蒙语人名：喜喜)啦。黄油酪丹奶子茶，塔奈的幸福多好啊。瞎眼的脑亥(蒙语：狗)还咬塔奈，塔奈急忙掏出烟袋，狠狠打它的狗咬盖(蒙语：头)，没的款待怨“玛奈”哇……“准格尔达拉王爷旗，准格尔地出了个乌云其。乌云其，生得美，爱你的后生实多哩。海莲花，乌云其花，玛奈口肯赛百津(蒙语：我的姑娘美极了)！”蒙语话融合熔化，友情亲善谁个听不懂！草原人听见的是悠扬调，晋陕人听见了心中的欢喜！

这漫瀚调，比蒙古长调激烈，比西部爬山歌悠扬，比起那凄凄惨惨的“走西口”，更是无比的欢快、敞亮！

这漫瀚调，就在歌王奇福林那激情四溢的脸上，放射着油冷的光亮和色彩！

这漫瀚调，就在母亲黄河的河套臂弯里漫漶滋长，潮涨潮起，漩游着远去……



丽江古城是越来越繁华了。

古城名叫“大研镇”，之所以是“大”，那是因为与世隔绝，多少年来任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、风云变迁，这里总是风平浪静，风景依旧。古人的眼睛里只有自己的城落，外面的世界是听来的，是好是坏都是陌生的，心就无限地大，没了边界，以为世界的中心无外乎也就这样的由砖瓦石块与木材构筑而成，自然就要叫“大”。

其实古城最初的名字叫“砚镇”，因为古城方正正，被山围绕着，浅浅地落在谷底，又是平整的，就像一方上好的砚台，摆在某户书香人家暗红色的柚木书几上。让人想到一双玉葱样的纤手，几滴漫洒开的清水，细细地研磨，如夜一般浓的墨在清水上缓缓地溢润。

不知什么时候古城的名字变成了“研镇”，有更多的学究气却叫人费解。砚台飞了，饱蘸着墨汁的笔停顿在空中，看着这喧嚣的城落，拥挤的人群。在哪里下笔？总让人有一种无人问津的感觉。

那被忘却到无人问津的是什么，是古城曾有的烟火气吧！

现在的古城，不但繁华，而且多元，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相安无事。要习惯在丽江粑粑的小摊旁边看到法国大厨的餐吧；要学会在非洲鼓手强劲的鼓点中辨别出纳西古乐温婉的旋律，哪怕它细若游丝；要同时拥有黑色短裙、彩色丝袜、带葫芦丝扣的传统旗袍和底部绣有民族风纹路的纯棉布大幅摆裙……因为任何一种装束在这里都不唐突，任何一种文化都在这里和谐共生。

丽江的古城向来没有城墙。早先听说是因为统管丽江的土司姓木，要是起了城墙就变成一个“困”字，今天想来，因为生在边隅，视线所达范围极其有限，开放应是古人在冥冥之中共同的心理期许。而面对古城的繁华，老人们总喜欢说，今天的丽江是浮着的，先前古城是茶马古道必经的集散地，抗战时滇缅路还没有修通的时候，物资都从这里通过，那是真正的繁华。那时商号店铺多达3000多家，进驻的银行就有9家，包括富滇银行、汇丰银行，老人们总觉得，那时的繁华才是沉下去的。

而我惟一感叹的，是那些已然被忘却的烟火气息，它们本该沉积在古城的尘世生活里，生机勃勃地存活着，展现市井最艳俗但又最可爱的一面；它们本该有绵延不绝的生命力，伴随着古城每一次潮起潮落，每一次动人心魄的变迁。

但现在，它们离去了，古城仿佛没有了内核。

比如语言，古城人像上海人，见面只讲方言，第三个人就是变成相片也夹不进去，语言密封度很好，而且见面就要驻足，天气衣服，菜市行情，里短家长，一句句都是掏心掏肺。时间可以大把地挥霍，直到旁边的小孩子站酸了脚，拼命地拉扯衣襟，谈话才会结束。而末了那几句突然高上去的吉利话，真个是余音绕梁。

古城人都是纳西人，就算是外迁来的牛

姓、李姓、习姓后来也都成了纳西人，纳西语

语音调高，语速快，音节变化多样，就像一首曲调高扬而又多有起伏的歌。而现在时间好像突然变短了，见面还说吉利话，话却明显地短了；地方也突然变窄了，于是，见面点点头，就算是打了招呼。

原住民很多已经移居，于是纳西语很难到了。

语言的消失会带走大部分的记忆，纳西语随着原住民的搬迁，散落到新城的各个角落，零星地点缀着，古城没有了集中的语言，显出了淡淡的陌生。哪怕商贩招徕顾客的声音无尽的甜美与热情，这种淡淡的陌生还是显出了冰冷。

现在的丽江在小学课程里增加了母语课，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会在校园的某个角落响起，那是一首久违的纳西族童谣，希望它能唤醒那些深深沉睡着的往昔生活。

空出来的租房，临街的全成了店铺，在巷子深处的成了客栈，交给能干的外地人来经营。古城的客栈真是尽显了主人全部的智慧与情趣，在外面看都是青瓦石墙，悬挂一排灯笼，没有差别，走进一看才知道什么是庭院深深，什么是别有洞天。

客栈要的是氛围，所以一面墙上蔓爬着的绿色金银花，某个角落里几株秀气的绿竹衬着旁边白瓷的鱼缸，中心一盆抢眼的大叶蝴蝶兰，都会让这个院落熠熠生辉。

就算如此，过的都是客，再怎样换取的也只是片刻的驻足，是横空掠过的目光，视线进入不了尘世的生活。

丽江没有真正意义的淡旺季之分，客栈从来没有萧条过，也不爆满，就是天天如一日的迎来送往，细水一样地流淌。

做服务业，人力需求自然大得惊人，很多

女孩子从农村、从山里集中到了古城的店铺和客栈，过不了多久皮肤就变白变细，普通话也

越来越规整。伶俐的话语，妩媚的眼神，轻盈

的微笑，渐渐就练出来了。

女孩年轻，根又不在古城，不晓得原来自己站立的地方曾经是家豆腐坊或丝绸店，清朝末期就有的，经历了民国、抗战、“文革”，也经历了地震和地震之后的重建……

不管是哪个年代，古城的清晨都会升起一柱风雨也动摇不了的炊烟，那是古城最早的炊烟。然后，烟再次次地升腾，街头卖凉粉的、做早点的、烙粑粑的、烧开水的，各种声音随着烟的升腾从各家各户关闭着的门窗里冒出来，挤出来，古城就真的醒过来了。

古城醒过来的时候，“李家大院”就会走出来李二奶奶，挎着一只竹篮，永远的青布蓝衫，颤颤的步履如踩着浅浅的扁舟。她的行走是古城时光的行走，缓慢、摇曳，像一种植物的生长。

李二奶奶路过酱菜场，路过豆腐坊，路过粉丝厂，路过百货公司，路过糕点店，跟每一个熟识的人打招呼，她会让清晨的阳光紧紧围绕着她的脚跟，会把唱歌一般的歌声停留在走过的每一个角落，河边一篮碧绿的青菜上，热气腾腾的早点摊前，某户人家窗下晾晒着的衣服上，孩子们奔跑的脚步声中，都会驻留着她的声音。

现在，“李家大院”依然还是这个名字，成了客栈，临着河，一串寂寞的灯笼在夜里倒映在河里，有风的时候，一河都是破碎的红。

这位古稀老人会讲英语，信奉天主教。传教士最早来到丽江的时候，她是混迹在人群中的孩子，眼睛清澈得如同黑龙潭新出的泉水。如今，她的行走，她的声音，连同她一切的存在，都是古城生活最尘世的那部分。

“李家大院”进出的都是客人，来得迅速，离开也迅速，相守和偶遇都是瞬间的事情。“李家大院”记不了这么多，就连李二奶奶，连同她曾经携带着的浓浓烟火气息，也将被遗忘在这来来往往的人和事构成的尘世生活里。

然而，家道的艰难并没有压垮父亲。

从20世纪的30年代到70年代，父亲一直在长江中下游驾船，到了许多地方，接触了不同的人和事。饱尝了不识字的苦楚，父亲越发感到

读书能改变命运，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。

1950年过完春节后，家里日子尚且艰难，父亲还是毅然拿出170斤小麦做学费，送我上了私塾，希望我上几年学，认得字，不做“睁眼瞎”。因为新中国成立，1951年私塾停办，新办小学只要交书本费，我也有幸从小学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。1960年，因为当时的政局环境，成绩优异的我被批为“白专”典型，压力之下不得不放弃读书去参军，回家告别父亲时，父亲说：“可惜书没有读完！”这句至今让我刻骨铭心。

儿女们没有上成大学，父亲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孙辈上。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老家，那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，同我的一次长谈，内容却是询问我如何筹措四个孩子的学费。后来才知道，父亲担心我生活困难，私下一直在省吃俭用给孩子们积蓄学费。

除了强调读书的重要性，经历过新旧社会的父亲更时刻让我们牢记，个人和家庭的成长离不开党和国家。

1951年土地改革，家里分得17亩土地，当时家里刚经历了火灾，生活还非常艰难，一向节俭到苛刻的父亲却一下就捐出了几百斤棉花，支援国家抗美援朝